



东方·剑桥世界历史文库
Orient &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Library

南斯拉夫史

约翰·R. 兰普 著 刘太平 译

Yugoslavia as History

John R. Lampe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东方·剑桥 世界历史文库
Orient &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Library

Yugoslavia as History

南斯拉夫史

约翰·R. 兰普 著 刘太平 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斯拉夫史/(美) 兰普著; 刘大平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6. 4

(东方·剑桥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7-5473-0919-3

I. ①南… II. ①兰… ②刘… III. ①南斯拉夫—历
史 IV. ①K5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3996 号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10-050

This is a 2nd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s)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Yugoslavia as History: Twice There was a Country/John R. Lampe/ISBN: 978-0-415-
77572-4

Copyright © 201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2010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责任编辑: 张爱民

责任印制: 徐儒静

装帧设计: 罗 洪

南斯拉夫史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毫米 1/16

字 数: 548 千字

印 张: 39.75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919-3

定 价: 7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021)52069798

致 谢

1987 年从威斯康星大学退休之后,我的导师之一迈克尔·彼得罗维奇(Michael Petrovich)打算着手写作一部曾作为一个国家和一种主张存在过的南斯拉夫史。次年迈克尔·彼得罗维奇去世,从而中止他的这项调研工作,即调研一个消逝的国家和一种被击败的主张。弗雷德·辛格尔顿(Fred Singleton)也没有见到把南斯拉夫的瓦解列入《南斯拉夫人民简史》的最新版本中。1985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南斯拉夫人民简史》,作为其 1968 年版斯蒂芬·克里索尔德(Stephen Clissold)编辑的《南斯拉夫简史》的后续。

我于 1993 年开始准备写作本书,部分出于对这一因迈克尔·彼得罗维奇的提前退休而未完成的工作的责任感。但是我也肩负着其他责任。辛格尔顿和彼得罗维奇的著作摆脱了研究这些领地和民族的根深蒂固的英美传统,理应接受我的充分感谢。当然,英国的传统更悠久,它始于人类学家亚瑟·埃文斯(Arthur Evans)在 1875 年到达波斯尼亚,并且通过菲利斯·奥蒂(Phyllis Auty)、斯特万·帕夫洛维奇(Stevan Pavlowitch)和其他人的著作延伸到弗雷德·辛格尔顿所建立的布拉德福大学南斯拉夫研究小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代美国专家先驱涌现出来。除了迈克尔·彼得罗维奇和我应感激的明尼苏达大学的蒂奥法尼斯·斯塔夫罗(Theofanis Stavrou)在巴尔干史方面的基础训

练和我在威斯康星大学的主要导师龙多·卡梅伦(Rondo Cameron)在经济史方面的基础训练之外,我应感激同查尔斯(Charles)、巴巴拉·耶拉维奇(Barbara Jelavich)、彼得·舒加尔(Peter Sugar)、韦恩·武契尼奇(Wayne Vucinich)和乔治·霍夫曼(George Hoffman)的长期交往。我还曾得益于更年轻的美国学者的著作,他们人数众多,远远超出了在注释中引用的可观数量,以至于不能在这里列举。

xiv 也应当提到过去 20 年之内出现的年轻一代的德国历史学家。他们已恢复其国家在东南欧学术研究方面在 20 世纪早期所享有的突出地位。柏林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的霍尔姆·桑德豪森(Holm Sundhaussen)和沃尔夫冈·霍普金(Wolfgang Hopken)的著作已经各自证明对我特别有用。罗兰·舍恩菲尔德(Roland Schonfeld)指导下的、设于慕尼黑(Munich)的东南欧协会(Südosteuropa-Gesellschaft)的刊物和活动也已证明对我特别有用。

我自己同前南斯拉夫的联系始于 1965 年。作为一位年轻的外交官,我一直任职于美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到 1966 年。在 1969—1970 年,作为一名研究生,我因为博士论文研究返回贝尔格莱德。从那时以来,作为马里兰大学历史学教授、1987 年后华盛顿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东欧研究室主任,进一步的研究已经让我无数次回到萨拉热窝、卢布尔雅那、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在前南斯拉夫战后历史学家的先驱一代之中,我广泛得益于卢布尔雅那的扬科·普莱特尔斯基(Janko Pleterški)、萨格勒布的米里亚娜·格罗斯(Mirjana Gross)和留博·博班(Ljubo Boban)、贝尔格莱德的丹妮卡·米利奇(Danica Milic)和布兰克·彼得拉诺维奇(Branko Petranovic)的著作。同时,他们和被提及的任何一位西方学者都不应当对本书文本承担责任。

因为我同前南斯拉夫的长期联系,一项进一步的职责存在于这些章节,即如何更具体地将前南斯拉夫暴力终结的未结束的悲剧和其历史连接起来,尽管其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相关但独立的各民族和地区,并且其起源于对 1918—1941 年、1945—1991 年两个南斯拉夫

国家和主张的可行性寻求。我把寻求这些联系而不是把寻求这两个南斯拉夫的更全面的历史,作为我的主要任务。歪曲经由选择的资料去为南斯拉夫的所有不幸而控诉一方或另一方,这在前南斯拉夫和后继国家中会起有害作用。贝尔格莱德历史学家安德烈·米特罗维奇(Andrej Mitrovic)曾恰当地把这种歪曲称为“准历史”。这种情况激励了我。在西方世界,这种矛盾控诉的混合体已经纵容了“古老的对抗”观念。虽然这种观念在历史上是错误的,但是这种观念仍然有助于拒绝承认组成南斯拉夫的各民族为欧洲人,并且将他们当前的冲突描述为原始问题。

这本简短的著作旨在从大量可得到的证据、学术研究和外交报告中集合足够的线索,去将两个南斯拉夫和它们的起源连接起来、将它们的实力和其弱点连接起来,并且将其血腥的失败和完整的历史背景连接起来。本书期望为学者们提供具有启发性的新的分析或解释。它也应提及及有利害关系的公众和负责任的公职人员及大学生。时势要求这样一本著作是可理解的、有权威的和有独创性的。补充书目主要是英文的并且也有德文的。其建议表明,从总体上看,与关于前苏联集团任何国家的著作相比,该著作的正文更为全面。这些注释,得感谢前南斯拉夫的所有组成部分所遗留的相当多的学术著作,并且感谢驻贝尔格莱德的英美大使馆和驻慕尼黑的“自由欧洲之声/自由之声”(Radio Free Europe / Radio Liberty)的有益报告所留下的档案。这些注释也寻求确认那些遗留许多重要历史争端的互相抵触的看法,特别在可靠的原始资料缺乏的地方,例如关于两场世界大战的看法还卷入了合法的争议。通过这些争议,这种叙述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这种叙述得出结论或省略细节,而一些严肃的学者和许多来自前南斯拉夫的、拥有当地经历的人士无疑将在这些细节中发现争议。我曾尝试把自己在那里作为局外人的经历与最广泛的学术观点以及我能够集合的原始资料结合起来,并且我已经尽力做到公平。

最后,我希望表达一些具体的感激之情。像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副主任小塞缪尔·F. 韦尔斯(Samuel F. Wells, Jr.)一样,

马里兰大学历史系的历届主任理查德·普里斯(Richard Price)、克利福德·福斯特(Clifford Foust)和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s)曾提供了自始至终的鼓励。我感谢《东欧思潮研究》(*Studies in East European Thought*),该期编辑克里斯托夫·尼日(Kristof Nyiri)在论文《南斯拉夫国家观念的失败》(《东欧思潮研究》1994年总第46期,第69—89页)中提供了把我的最初建议传播到更广泛主题的机会,并且感谢拉塞尔·O. 普里克特(Russell O. Prickett)和柳比萨·艾丹奴维奇(Ljubisa Adamovic)在我们的合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南斯拉夫和美国的经济关系》(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中所表现的见识。也应当感谢1993年在萨格勒布和卢布尔雅那同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就被提议的目录进行的圆桌讨论,以及同年与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历史学家的非正式会议。

该书的二手资料或原始资料来自一连串的单位,这些单位工作人员全都一贯乐于助人。这些地点是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在伦敦的公共档案馆(the Public Record Office)、在慕尼黑的“自由欧洲之声/自由之声”档案馆、在贝尔格莱德的“当代史学会”(the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History)和伊利诺伊大学、马里兰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的几个图书馆。非常感谢1993年“自由欧洲之声”对我在慕尼黑的一个月研究的支持和1994年“人文科学学会”(the Institute for Human Sciences)对我在维也纳的一个月写作的支持。

在该项工作的后期阶段,我获得了来自各种挑剔的读者们的重大帮助,他们是:盖尔·斯托克斯(Gale Stokes)、丹尼森·拉西诺(Dennison Rusinow)、萨布丽娜·佩特拉·拉梅(Sabrina Petra Ramet)、德拉戈·洛克桑迪奇(Drago Roksandic)、尼古拉斯·米勒(Nicholas Miller)、克莉丝汀·亨特(Kristin Hunter)、安妮塔·贝克·兰佩(Anita Baker Lampe)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征求的几位匿名读者。他们不分担我对最终文本所负有的任何责任。已出版的该书也受益于克莉丝汀·亨特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审稿工作、乔纳森·金博尔(Jonathan

Kimball)和菲利普·伯克尔巴赫(Philip Birkelbach)编制的统计表,以及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鲍林制图公司的拉里·A. 鲍林(Larry A. Bowring)绘制的地图。印第安纳州南本德的莉丝·安·索尔(Lys Ann Shore)出色地编写了索引。如果没有安妮塔·贝克·兰佩的坚定支持,特别是在周末和晚间写作的一年半期间的坚定支持,我本人是不可能完成本书的写作的。

第二版前言

xvii

1993年,我怀着一种悲哀的义务感开始写作本书的第一版。似乎对大多数西方观察家而言,与邻近的苏联集团拥有的任何成员相比,前南斯拉夫的暴力终结失去了超越战后共产党政权限制的一个更好机会。对全东欧而言,1989年之后,当这个机会到来时,南斯拉夫已经成为“我们只能在历史书中阅读而知的一个地方……它随风而逝”。我试图把我的历史书和《飘》(*Gone with the Wind*)的怀旧分开。但是我也寻求置身事外于后继国家中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倾向。这种倾向就是,将其多数种族和领土看做与两个共同国家几乎没有过去的联系——当然是没有什么建设性的联系。太多的西方观察家都有这种倾向。

种族战争和混乱的过渡现在已经持续了整整10年,这些后继国家努力使其自身同那些真实存在的联系摆脱干系。这些努力已给这些过渡贴上标记。它们的斗争为该书第二版提供了主要理由。该书第二版关于1991—1999年冗长的新章节记录了后继国家中的一些进步和成绩,但却留给我另一个喜悦少于悲叹的十分糟糕的任务。在着手写作最近几年的事件时,我不得不依赖于筛选的二手资料和这10年间我对该地区的12次访问所作的观察报告。历史学家更喜欢依靠的关于第一南斯拉夫的原始资料仍有待充分研究,关于第二南斯拉夫的原始资料仍有待完全公开。尽管几乎完全没有20世纪90年代的原始资料,

但是即使在科索沃最近发生的悲剧之前,对整个欧洲和美国而言,在防止更多的种族战争,并且在重新联合整个东南欧方面,死亡、流亡或离散的确太巨大,并且赌注太高,以至于不能避免面临我也称之为即时历史的挑战。

在修订第一版“序言”和 11 个章节时,有相当多的因素继续存在着,故而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近来在一个继续使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名称的后继国家中爆发的战争,要求更加重视科索沃、马其顿和黑山的民族史。在篇幅允许和一种共同命运或民族间关系的某种关联存在的地方,我已经纠正了此前对独立文化史的有意识忽视。我特别注意去阐明这些简化部分,并纠正最频繁出现于最初的世纪跨越章节中的简单事实错误。这有益于那些希望在此基础上从一种或另一种独特视角去理解该书后面部分的挑剔读者。

从我的书第一版以来,持续缺乏关于前南斯拉夫的任何新的总体研究,与此同时,除了一大批新闻论述以外,出现了许多关于特定领域和时期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的研究和学术成就,因此我找到修订该书和增加第 12 章的进一步理由。该新章节的脚注列举了仅仅论述 20 世纪 90 年代的 20 本出版物,扩展的书目增加了 40 本英文或德文书籍。修订后的章节注释包括用各后继国家的现在独立的语言创作的重要的新著作。我也特别乐于借鉴以下九位年轻的美国学者的著作或博士论文:梅利莎·鲍克沃(Melissa Bokovoy)、奥黛丽·赫尔芬特·巴丁(Audrey Helfant Budding)、吉尔·欧文(Jill Irvine)、卡罗尔·丽莱(Carol Lilly)、凯瑟琳·麦卡锡(Katherine McCarthy)、尼古拉斯·米勒(Nicholas Miller)、马尔科·普瑞雷克(Marko Prelec)、韦利科·武贾西奇(Veljko Vujacic)和安德鲁·沃赫特尔(Andrew Wachtel)。1987—1997 年,我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指导东欧研究计划时,他们每年参加东欧研究计划的青年学者培训研讨会。从而我首次熟悉他们的著作。

也应当提到我曾试图获益于第一版的众多评论、与后继国家学者们关于此书进行的一系列圆桌会议和个别谈话,以及我就一个重要的

新档案进行的咨询和该新章节的几位读者。这里不宜感谢大多数的完全好评,或者继续我与伊沃·伯纳克(Ivo Banac)之间关于我的最初章节是否指南斯拉夫必然崛起的争论。这里更适于特别提到因其详细的评价和建设性的批评而对我最有用的两篇评论,即:詹姆斯·克劳卡(James Krokav)于1997年在互联网上发表的《哈布斯堡王朝评论》(*HABSBURG Reviews*)中所涉及的评论,以及斯洛博丹·G. 马尔科维奇(Slobodan G. Markovic)1997年10月15日在贝尔格莱德报纸上发表的评论。卢布尔雅那法学院的圆桌讨论、贝尔格莱德的“当代史学会”(the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History)和斯科普里的“马其顿科学和艺术学会”(the Macedon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rts)也是有价值的。我有益地查阅了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的新“开放社会档案馆”(Open Society Archives)的报纸集。我特别感谢史蒂文·伯格(Steven Burg)、雷纳德·科恩(Lenard Cohen)和查尔斯·英格劳(Charles Ingrao)对该新章节初稿的评论。

xix

本书言论所负的责任仍然是我自己的。我试图进一步澄清公民和学生们寻求理解的这个复杂主题,并且进一步澄清政策制定者已作出或尚待作出的决定。我也试图置身事外于近来经历的、互相抵触的确定性,这种近来经历被记住并且被用做解释过去的一条途径。在解体和战争的10年之后,这样的回忆加深了后继国家的民族分裂,并且它们以其简单性继续去吸引西方观察家。我也不参与为这两个逝去的南斯拉夫辩护,更不必说鼓励第三个南斯拉夫的前景。我只不过试图找出使这两个南斯拉夫联合和分裂的多方面的历史。两者都不值得留下作为近来回忆的唯一来源。

约翰·R. 兰佩于马里兰的帕克学院

1999年9月

致谢 / 1

第二版前言 / 1

绪言：可行性探究 / 1

第一章 帝国和分裂的边疆(800—1800) / 11

山脉第一,水最后 / 12

短暂的本土国家,长久的记忆 / 16

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多样性 / 24

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多样性 / 32

帝国分裂的例外 / 39

第二章 统一的渴望和乡村的抵抗

(1804—1903) / 46

从伊利里亚省到南斯拉夫的主张(1806—1860) / 48

作为 19 世纪民族国家的塞尔维亚 / 56

作为微型国家的黑山 / 67

哈布斯堡王朝领地中克罗地亚人和南部斯拉夫
人的主张(1860—1900) / 69

波斯尼亚从奥斯曼帝国转到奥匈帝国的统治下 / 77

作为南斯拉夫前哨的达尔马提亚和

斯洛文尼亚 / 81

第三章 新的分裂、南斯拉夫人的纽带和

巴尔干战争(1903—1914) / 84

哈布斯堡王朝领地中分裂的发展和党派政治 / 88

塞尔维亚上升的声望和 1908 年波斯尼亚危机 / 98

巴尔干战争和新的南斯拉夫前景(1912—1914) / 108

第四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一南斯拉夫

(1914—1921) / 120

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委员会”(1914—1917) / 121

从斯洛文尼亚到塞尔维亚的战时政权 / 126

萨格勒布全国委员会和贝尔格莱德的统一 / 131

西方政策和边界争端 / 134

政治统一的经济障碍 / 140

为了单一宪法而举行的引起分裂的选举 / 144

第五章 议会制王国(1921—1928) / 152

战前的政治家、新政党和《圣维特宪法》框架

(1921—1926) / 154

文化上的联系和经济分离 / 171

敌对的邻国和遥远的盟友 / 181

灾难性的“十字路口”(1927—1928) / 187

第六章 独裁主义的王国(1929—1941) / 193

王室专政(1929—1934) / 195

斯托亚迪诺维奇和王室摄政时期(1935—1938) / 208

第一南斯拉夫的资产负债表(1921—1939) / 220

从《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协定》到《三国轴心协定》

(1939—1941) / 229

第七章 世界大战和内战(1941—1945) / 237

第一南斯拉夫的毁灭 / 238

“克罗地亚独立国家”、占领政权和积极的反抗

(1941—1942) / 248

共产党的优势(1943—1944) / 257

巩固共产党政权(1945) / 267

第八章 建立第二南斯拉夫(1946—1953) / 275

根据《1946年宪法》巩固权力 / 276

挫折和铁托—斯大林的分裂(1947—1949) / 285

沿着南斯拉夫的道路迈出的第一步 / 299

第九章 上升时期的铁托的南斯拉夫

(1954—1967) / 311

在东西方之间寻求平衡 / 313

西方市场和自我管理的企业(1954—1962) / 325

市场改革和兰科维奇的倒台 / 333

第十章 铁托的南斯拉夫的衰退时期

(1968—1988) / 349

反对派公开化(1968—1969) / 350

从“克罗地亚危机”到《1974年宪法》 / 356

从半市场经济到契约经济 / 367

外交政策和债务危机(1979—1985) / 374

联邦领导层的失败和经济衰退(1986—1988) / 380

第十一章 种族政治和南斯拉夫的终结 / 385

社会压力和地区关系 / 387

新领导人和新政治 / 400

致命的“十字路口”(1989—1991) / 408

第十二章 种族战争和后继国家(1991—1999) / 423

战火绵延(1991—1995) / 427

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战时政治 / 443

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的战后政治 / 454

后继国家经济和南斯拉夫的遗产 / 461

科索沃:战争终于爆发 / 472

注释 / 483

进一步选择性阅读(英文与德文的相关著作) / 560

索引 / 579

绪言：可行性探究

南斯拉夫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Emir Kusturica)最初想要把其纪念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崩溃的那部有争议的电影命名为《曾经存在一个国家》。他的制片人可能着眼于戛纳电影节(1995年该片在戛纳电影节赢得“金棕榈奖”),之后放弃了该片原著小说的标题,并且选择了更适于销售和更求实的标题:“地下”。实际上,该片极具冲击力的情节带领我们与几位共产党员一起,度过了1941—1991年的半个世纪。他们腐化的领导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让他们待在地下几十年。他们暂住在老贝尔格莱德要塞下面的一个山洞中,相信法西斯主义者尚未被打败,战争还在地面上肆虐。当其计划在20世纪60年代最终失败时,该领导人炸毁这个山洞但是未能全部杀死这些党员。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南斯拉夫的瓦解和战争,最后幸存者们才能够向他报仇。

杜尚·科瓦切维奇(Dušan Kovačević)的小说标题避免了这种寓言式的推断,即铁托使南斯拉夫民众保持地下状态或不了解外部世界,直到他在1980年去世。另外,这部哀伤的、近似亚瑟王传奇的原著可以被翻译为“曾经存在一个国家”。它直接提醒我们,这些虽然相似却独立的各地区被结合成一体。本书专注于南斯拉夫政治统一的起源和试验。第一次世界大战缔造了一个南斯拉夫,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这

个南斯拉夫,随后缔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南斯拉夫。

本书的副标题“两次存在一个国家”听起来较少哀伤,并且也提醒我们,即第一南斯拉夫(1918—1941)先于第二南斯拉夫(1945—1991)。两者都不值得理想化为某个现代的卡米洛特(Camelot,传说中英国亚瑟王宫廷所在地),甚至超出前南斯拉夫的某些居民“对南斯拉夫的怀念”。但是最初的王室专政和随后的共产党专政也不应被谴责。下列各章间接表明这两个多民族国家具有的实力和弱点。两者都努力实现这种最终使它们困惑的可行性。

2 第二南斯拉夫的血腥终结吸引西方观察家们从目前的僵局去探索南斯拉夫的民族和国家的斗争。但是沉浸在过去会导致令人不快的历史。除了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首先发生流血事件,然后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发生流血事件以外,斯洛文尼亚如外科手术般地分离。南斯拉夫后继国家的近来战争,对参与各方自身而言,无疑已经更难以使其自身历史同过去10年相分离。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政治上被操纵的媒体鼓励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这两个最大的民族,把另一方目前的意图看做被排外主义者驱动的19世纪民族主义和重复两次世界大战罪行的一种倾向。太多的塞尔维亚人把该前共和国的最大民族——波斯尼亚穆斯林看做土耳其人或斯拉夫人的变节者。这些斯拉夫人的变节者愿意重新开始奥斯曼帝国对塞尔维亚农民的利用,塞尔维亚农民把皈依伊斯兰教作为唯一的逃脱方法。于是各自的领导人和媒体使另一方目前的居民转变为“想像的对手”。¹他们也鼓励外国观察家去假定旧联盟的复活,这些旧联盟即塞尔维亚人和俄国人、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土耳其人,以及克罗地亚人和德国人的联盟。此后其各方的历史维度已经极大地夸大了。如果不依靠选择性的历史回忆和虚假的类比,那么近来战争的冲击和日常生活的中断使幸存者仍然很难理解目前。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中最英雄的人物是回忆和类比的一个囚犯。本书更有理由尽可能客观地追踪挑战两个南斯拉夫的趋同的、独立的和模棱两可的潮流。

不像1941年纳粹毁灭第一南斯拉夫,50年以后第二南斯拉夫的